

當和平崛起遇上台灣問題： 菁英認知下的中國安全戰略

陳 牧 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本文嘗試由國內角度，特別是中國領導人及部份政治菁英對中國所處的國際安全環境提出的主觀理解，來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定調安全戰略的過程。對國家安全的解釋與定位一直是中共政治菁英在中國逐漸溶入國際政治與經濟體系過程中企圖保障其權力及利益所運用的工具。領導人與戰略學者等政治菁英所「認知」的外在環境基本上是受到兩個因素影響：第一是對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評估；第二是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自我定位。二者交互影響，構成領導人心中對中國國家發展方向與國際地位的主觀期待。討論重點將放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對外戰略的一些新發展趨勢，以及中國崛起戰略與台灣問題之間的關聯。

關鍵詞：中國外交、安全戰略、和平崛起、台灣問題、政治菁英、認知理論

* * *

壹、和平崛起戰略風波

2003 年 12 月，中國總理溫家寶應邀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演講，正式提出「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的概念。在這篇名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裡，溫家寶指出：

我們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更加充分和自覺地依靠自身的體制和創新，依靠開發愈來愈大的國際市場，依靠把龐大的居民收入轉為投資，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科技的進步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要義就在於此。^①

溫的演講呼應了 11 月初，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現任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在海南博鰲論壇演講時提出的「中國的崛起將是和平的崛起，而不是挑戰和威脅」

註① 「溫家寶總理哈佛演講：把目光投向中國」，人民網，2003 年 12 月 11 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shehui/1061/2241298.html> (檢索日期：2006 年 2 月 10 日)。

的說法。^②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則是在當年 12 月 26 日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週年座談會上首次提出和平崛起的概念。^③2004 年 2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第 10 次集體學習時，胡錦濤再度提出「要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則」。^④一時之間，「和平崛起」儼然成爲領導人闡述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要論述，甚至有凌駕「三個代表」之勢。^⑤另據台灣媒體報導，和平崛起論述是在胡錦濤上台之後，由其主要智囊鄭必堅率領一個以中央黨校教授爲基礎的 20 多人理論班底打造出來，作爲胡錦濤時代中國國家發展戰略。中共中央甚至還撥款兩百萬人民幣資助這項理論研究。^⑥

正當各界開始注意中國官方如何以「和平崛起」作爲胡錦濤時代中國國家發展戰略之時，又傳出該口號在黨內遭到江澤民派系的反對。江系人馬在一連串內部會議上直指和平崛起論述不當，不僅不能駁倒盛行於西方的「中國威脅論」，反而讓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崛起更加疑慮。因此胡錦濤在 2004 年 4 月海南博鰲論壇開幕式中，已不再使用「和平崛起」的說法，只強調「和平發展」。自此之後，中共官方即全面避用「和平崛起」。海外媒體多認爲「和平崛起」風波基本上是江、胡兩派爲鞏固意識形態與政策路線解釋權鬥爭的結果。^⑦

無論領導人如何定位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角色，「中國威脅論」與「和平崛起論」將繼續成爲當前國際社會對中國未來角色的兩種主要看法。這樣的分歧其實也反映出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兩大傳統——「現實主義」(Realism)與「自由主義」(Liberalism)之間的差異。認同現實主義的學者主張追求權力(power)是主權國家的本能，而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否取決於國際上主要強權之間的權力關係。「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不僅是主要強權間彼此競逐權力的結果，也是國際社會保持長期和平的關鍵因素。^⑧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大陸目前的快速經濟成長與軍事現代化正爲

註②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未來」，2003 年博鰲論壇演講，2003 年 11 月 3 日，<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OP-c/448115.htm> (檢索日期：2006 年 2 月 10 日)。該演講修飾後之英文版本請見 2005 年 9/10 月份美國外交事務季刊：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18-24.

註③ 「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 110 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政府網，2003 年 12 月 26 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5-06/26/content_9580.htm (檢索日期：2006 年 2 月 20 日)。

註④ 賴錦宏，「胡錦濤強調國家主權放第一位：中共政治局集體學習，指示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聯合報，2004 年 2 月 25 日，第 A13 版。

註⑤ 中共官方對「和平崛起」概念的闡述，可見 2004 年 3 月 29 日解放軍報所載「中國的和平崛起有利於世界和平發展的戰略選擇」一文。解放軍報(北京)，2004 年 3 月 29 日，第 11 版。

註⑥ 「胡錦濤下令建構和平崛起理論」，聯合報，2003 年 12 月 16 日，第 A13 版。

註⑦ 王銘義，「只談發展，不談崛起」，中國時報，2004 年 8 月 29 日，第 A4 版；John J. Tkacik Jr., "China's Peaceful Rise at Stake in Power Struggle," *Asian Times*, September 8, 2004: <http://atimes.com/atimes/China/FI08Ad03.html> (檢索日期：2006 年 2 月 20 日)。

註⑧ 將「國家追求權力」做爲核心論述的現實主義學者最著名的是 Hans Morgenthau。其著作 *Politics Among Nations* (1948) 被視爲 20 世紀最有系統闡述現實主義論點的書籍。主張「權力平衡」概念的則是將 Morgenthau 論點做進一步發揮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創始者 Kenneth Waltz。Waltz 認爲國際政治結構上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本質使得所有國家成爲類似的單元(like units)，並爲了生存需要而執行相同的功能(perform similar functions)；因此國際政治結構的型態是強權之間能力分配的結果。見：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未來躍升為世界強權奠定了堅實基礎。在經濟實力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中國必定會採取擴張性的外交與軍事政策、破壞權力平衡、危及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自由主義學者的看法則截然相反，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並不必然是相互衝突的，國家間可透過貿易、交往等方式化解歧見、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自由主義者認為中國大陸將延續目前擴大與世界各國交往的政策，由於各國間經濟整合程度不斷增加，再加上中國對外開放的方向與步調不變，將使得大陸快速且全面地融入世界經濟，進而對其外交行為產生一定的約束作用。^⑨

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學者都企圖以國際政治裡結構 (structure) 與單元 (unit) 之間的互動方式作為理論所欲解釋的對象。這些理論都假設「國家」是單一理性行為者 (unitary rational actor)，以追求最大利益為對外關係的準則。二者並未說明結構與單元之間究竟是透過物質利益 (material interest)、強制力 (coercion)、還是彼此之間的認知 (cognition) 產生互動。此外，雖然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分別為「中國崛起是不是威脅」的命題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但因為在國際關係發展史上都能找出崛起強權是否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正反面實例，所以反而大大降低了這些理論對當今中國的適用性。理論既不能告訴我們中國領導人在改革開放這二十年來究竟建立起什麼樣的一種世界觀，也不能告訴我們這樣的世界觀究竟對其安全戰略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

「和平與發展」論述的出現，其實更反應出胡錦濤等新一代領導人的世界觀，以及依據這樣世界觀所建立的對外戰略思維。故本文將嘗試由國內角度，特別是領導人及部份政治菁英對中國所處的國際安全環境提出的主觀理解，來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為安全戰略定調的過程。這樣的研究方式主要是受到當代一些反對以主權國家所組成的國際體系 (international system consists of sovereign states) 作為研究國際關係基點的新研究取向的啟發。其中一種觀點受馬克斯主義的影響，其論述重點放在握有統治權力的「政治菁英」 (political elites) 極力維護其統治地位的作為與對外政策之間的聯繫。^⑩以統治菁英為研究基礎的政治理論並非馬克斯之創見，19 世紀義大利學者 Vilfredo Pareto 與 Gaetano Mosca 往往更被視為菁英政治理論的始祖，現代國際關係理論家如 Stephen Krasner 對主權的研究也嘗試將決策者 (rulers) 視為影響國際體系制度的主要行為者。^⑪但現代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y) 學者如 Robert Cox 嘗試將唯物史觀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與菁英論結合，一方面主張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同階級之間的經濟關係扮演了絕對的主導力量，另一方面主張「國家安全」概念本身

註⑨ 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自由主義傳統包含幾種不同觀點，但以 Robert O. Keohane 與 Joseph S. Nye Jr. 所主張的新自由制度主義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最具影響力。2 人主張國與國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將使得兩國間產生多重議題溝通管道 (multiple channels)，議題間不再具有高低位階的差別 (absence of hierarchy among issues)，且使用武力解決爭端的機率降低 (minor role of military force)。見：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註⑩ Yale Ferguson and Richard Mansbach, *The Elusive Que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3), p. 167.

註⑪ 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7~9, 43.

就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統治精英為維護自身利益所作出的對外在環境的特定解釋。¹²

Cox 的批判主義理論，主要是依據西方馬克斯主義理論家 Antonio Gramsci 的「霸權」(hegemony) 概念，來檢視全球化潮流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如何強化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保障此一體系內主要國家的利益。霸權是 Gramsci 論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統治階級維持其統治地位的主要論述。他認為統治階級除了照顧其利益集團之外，也同時運用知識、道德、社會制度等種種力量，造就出一種整合各種社會勢力的「歷史集團」(historical bloc)。在此歷史集團內，下層階級的要求獲得某種程度的滿足，而統治階級也得以建立一個支持其繼續統治的集體意識。Cox 把此一論述運用到國際體系中，主張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其實是主要生產方式 (dominant modes of production) 與各種次要生產方式 (subordinate modes of production) 產生連結，創造出的一種穩定秩序。強權內部統治階級所創造出來的霸權逐漸擴散到社會所有階級，再擴散到其他國家。領導霸權的國家必須創造並維護這個過程中所建構出來的秩序，而其他國家統治階級對霸權的擁護也是使其獲利並繼續保持統治地位的主要方法。所謂經濟全球化便是資本主義內部霸權發展過程的一個高等階段。¹³雖然 Robert Cox 等人偏好以唯物論作為立論基礎，但論述重點仍放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內之統治階級如何以建構「國家安全」政策之方式強化其統治基礎，故西方學界多半將批判理論歸類在受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所影響之西方馬克斯主義 (Western Marxism) 陣營，與一般所認知的馬克斯列寧主義 (Marxism-Leninism) 意識形態 (即蘇聯及中共所堅持之無產階級專政及計畫經濟) 有很大的區別。¹⁴

另一種觀點是分析「行為者對環境的認知」如何影響外交決策。這類認知理論 (cognitive theories) 興起的原因是部分學者企圖把國際政治理論由過去專注在行為者 (actor) 追求利益極大化 (interest maximization) 的實證主義傳統 (positivism) 提升到知識論 (epistemology) 甚至本體論 (ontology) 的層次，直接挑戰傳統實證主義所建立理論的正當性。¹⁵受實證主義影響的學者習慣將「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 與

註 12 本研究決定不採 Kransner 的理論主要是因為其研究主要在探討主權概念的實踐，而 Robert Cox 的菁英論重點在統治菁英利用對國家安全的權威性解釋權創造出維護其權力基礎的環境，比較符合本研究之假設。

註 13 Robert Cox 以批判理論方式分析國際關係理論，請見：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vol. 10, no. 2 (1981), pp. 126-155；菁英如何以國家安全鞏固其統治權威的研究請見：Robert W. Cox and Timothy J.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3-137; 276-295; David Goldfischer, "Resurrecting E.H. Carr: A Historical Realist Approach for the Globalisation Er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8, no. 4 (2002), pp. 697-717.

註 14 批判主義理論家認為安全和其他所有人類社會存在的思想觀念一樣，象徵著主流知識體系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當代政治現象所發展出的特定理解。批判理論的觀點源於馬克斯主義與唯物史觀，因此強調人必須從統治階級所建構出的政治與社會秩序中解放出來，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以批判理論角度來研究國際關係之論點可見：Richard Devetak, "Critical Theory,"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6), pp. 145-178.

註 15 國際關係學者常使用不同字彙來稱呼此一研究取向，如建構式理論 (constructive theories)、理念性理論 (ideational theories)、文化理論 (cultural theories) 與反思理論 (reflective theories)。為免產生混淆，本文一概以認知性理論稱之。

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當成客觀存在實體(objective realities)。但受認知理論影響的學者主張人類社會對主權國家與國際社會中的無秩序狀態的理解僅僅是特殊歷史與社會條件下的產物。^⑯而過去研究國際體系成員利益或行為的方式大多直接認定行為者是依理性自利的原則來行事，忽略了成員本身對周遭環境或其他成員的理解其實是受制於該成員與周遭環境的關係。人類所理解的國際政治的現象其實是歷史發展過程中某些具有主導地位的「規範」(norms)影響人類思想的結果，而行為者的利益並不能單純以效益極大化的理性原則來解釋，必須追溯行為者在環境影響下所建構出的「特定身份」(identity)。^⑰強調認知因素的學者認為如果不深究這些規範和身份的起源，直接把行為者的利益和行為當成研究對象，便不能準確地理解行為者與外在環境之間的關係。^⑱無論是「規範」或「特定身份」，均非物質力量(如武器數量、領土大小)的直接反映，而是行為者對外在環境的主觀理解，因此稱之為認知因素。

最早系統性分析「認知」如何影響外交政策之研究是 Judith Goldstein 與 Robert Keohane 於 1993 年編寫之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一書，其中將影響外交政策的認知因素分為「世界觀」(world views)、「原則信念」(principled beliefs，即因價值觀所產生的規範性原則)、與「因果信念」(causal beliefs，即由菁英創造出具有權威性且為一般大眾所接受的因果性解釋)等三種。但作者們對這三者影響外交政策之程度仍未形成一定的共識。^⑲這或許與當時學界仍在努力探索社會建構論的核心概念有關。Peter Katzenstein 等人於 1996 年出版之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是正式將社會建構論的研究方法引進安全研究領域最重要嘗試，並為日後學者以認知論角度分析「規範」與「特定身份」影響安全政策提供了完整的分析架構。^⑳

註⑯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Williams, "From Strategy to Security: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Studies," in Krause and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36-43.

註⑰ 在認知理論中，「特定身份」指涉的是行為者(國家)在與環境及其他行為者的互動過程中對自身地位的認定，而「規範」可定義為行為者在特定身份下所必須遵守的集體行動規則。見 Ronald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4, 59.

註⑱ 此一領域最著名的就是美國學者 Alexander Wendt 代表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Wendt 認為，國際政治中主要行為者之間的關係(友好或是敵對)取決於這些行為者在環境影響下所建構出的特定身份。建構主義者不認為身份是客觀的存在(objective existence)，而是行為者與其外在環境在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互動過程中建構出來的結果。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 71-81;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 171-200; 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50 (January 1998), pp. 324-328; 中文介紹請見：莫大華，「論國際關係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9 期(1999 年 9 月)，頁 93-108；黃旻華，「評『論國際關係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11 期(2000 年 11 月)，頁 71-94。

註⑲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11.

註⑳ 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1.

可惜的是，主張菁英論與認知理論的學者之間至今仍然缺乏真正的對話。這或許與二者所專注的議題不同有關：前者強調統治菁英對政策的權威性控制，而後者主要是企圖解構實證主義傳統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力與主權等概念，也有可能是這兩種理論並未如傳統實證主義理論發展出完整的科學性研究方法。由於此兩種理論無論在分析對象及推理方式上完全不同，反而使得二者呈現出一種互補現象：菁英論能彌補認知論研究主體不明確的缺點，認知論則點出菁英利益形成的背後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將菁英論與認知論結合或許是一個大膽的嘗試，但如果僅借重菁英論中對菁英掌握對國家安全的權威性解釋與認知論中決策者將其對環境認知轉化成實際政策的論述，便可以建立一個不同於傳統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分析架構。本研究認為，對當代中國安全戰略的理解，必須由政治菁英所認知的外在世界（是否充滿威脅）以及政治菁英實際所做的政策宣示（如何論述對外政策）這兩個角度來切入。這樣的論述方式基本上是對 Ronald L. Jepperson、Alexander Wendt、與 Peter Katzenstein 等人於 1996 年所提出之分析架構的修正。Katzenstein 等人的研究著重在「規範」與「特定身份」如何影響國家利益。但本文進一步將「政治菁英」作為「規範」與「特定身份」影響的對象，再經由菁英對國家利益做出權威性解釋，如此便能完整呈現菁英對國家安全戰略的建構過程。這樣的研究方式有兩個目的：第一、認定「國家安全」其實是政治精英在不同時期下為因應國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化所作出的基本判斷和相應對策。國家安全政策不在維護抽象的「國家利益」，而是政治菁英認知外在環境的產物；第二、把分析重心由建構主義學者所強調的「認知」轉移到「政治菁英」的做法不僅可以把研究方向濃縮到適合實際操作的規模，更能把菁英的認知與實際政策等兩個變項聯繫起來，直接觀察二者的關係。圖一即為對 Katzenstein 等人在 1996 年提出之建構主義國家安全觀所做的修正。^①其中「規範」指的是國際環境下集體認可的某些行為準則或共識（如禁止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而「特定身份」則是行為者與環境及其它行為者互動過程中對自身地位的認定（如台灣自認為是未獲國際社會平等對待的主權國家）。此二者不僅相互影響，也進一步影響政治菁英，使菁英建構出其認知的國家利益（perceived interest）。實際政策不僅是政治菁英所認定之利益下的產物，更可能反向影響規範及特定身份。^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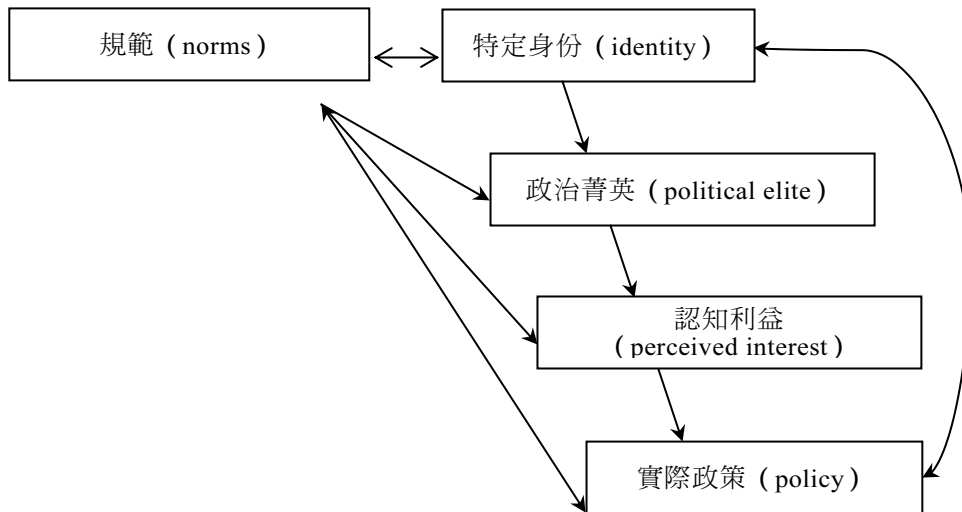
以菁英認知角度來分析當代中國的對外安全戰略，即構成本文之主要假設：

對安全戰略的解釋與定位一直是大陸政治菁英在中國逐漸溶入國際政治與經濟體系過程中企圖保障其權力及利益所運用的工具。政治菁英所「認知」的外在環境以兩種途徑來呈現：第一是對於國際社會對中國未來看法的反應；第二是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自我角色定位。二者交互影響，構成政治菁英認知的國家利益，進而影響實際的安全戰略。

註① Katzenstein 等人在原圖中是使用「環境結構」（environmental structure）一詞來代表規範（norms），在此決定以規範代替之。

註② Ronald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op.cit.*, pp. 34-75.

圖一 政治菁英建構安全戰略之過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由中國對外關係的發展過程來看，領導人所宣示的安全戰略並不完全是受到外在國際體系變化的影響。中央領導人往往為了國內政治目的，以因應國際環境變化為名，對國家發展方向做出重要的解釋或定位。這樣的動作源自於中共領導人以掌控意識形態與政策路線解釋權的方式來鞏固權力的傳統。而中央領導人以外的政治菁英如學者，在改革開放早期多半只能被動地詮釋上級已提出的主張，或在上級授意下建構新的理論，但近年來已有學界出身之政治菁英嘗試提出新的概念並獲得上層重視，決策向下擴散的趨勢逐漸明顯。本文第三節所探討的中國崛起方式辯論就是由學界發起討論，進而對領導人產生影響的範例。當然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的外交決策圈仍十分少見，大部分學者處理對外戰略的議題仍傾向採取比較被動的立場。為了讓讀者對中國安全戰略有更清晰的理解，以下分析將集中在三個相關問題：

第一、改革開放以來政治菁英所認知的外在安全環境是否有所變化？

第二、「中國崛起」的相關論述為何在 1990 年代中期出現，而這些論述又如何影響後來的中國對外安全戰略？

第三、中國安全戰略之相關論述如何處理所謂的「台灣問題」？

本研究所認定的政治菁英，主要是有能力接觸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之相關資訊、並且能實際影響決策的黨政領導人、政府或研究單位內之研究員、以及學術單位之學者。非外交或戰略領域的菁英並不在探討之列。但鑑於研究方法與時間的限制，本文僅能就過去 20 餘年來中國對外戰略的相關文獻選擇部分進行分析。主要文獻內容來自此一時期內黨及國家領導人的公開言論、研究外交或安全戰略之主要學者們在公開發行之相關期刊上所發表的言論，以及部分在中國被認定是對外政策意見領袖所出版的著作。採取此一研究方式之主要理由是在中國這樣的非民主國家內，對外交或安全戰略的論述權主要仍集中在極少數領導人及學者手中。而這些政治菁英除了實際參與決

策之外，更往往透過公開政策宣示、或以在外交或安全領域的相關期刊發表政策評論的方式展現其影響力。此現象與一般民主社會中公民利用媒體對國家外交政策發表意見的方式不同。因此，分析決策者或政治菁英言論的研究方式已被視為分析當代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要途徑之一，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②研究對象（即本文所稱之政治菁英）之選擇難免失之主觀，但主要是根據筆者於 2001 年 2 月至 6 月、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1 月、以及 2005 年 3 月間於北京地區訪問約 40 餘位政府官員及國際關係學者所得之名單修改而成。雖然這些領導人、官員及學者不足以包含所有對安全戰略有影響力之政治菁英，但其觀點應足夠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安全戰略的發展提供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

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安全戰略的演變過程

在國際政治裏，「大戰略」（或稱總體戰略，Grand Strategy）指的是一個國家的決策者對當前國際形勢，以及國內政治、經濟、軍事狀況進行總體評估與判斷之後，在對外政策上所做的根本定位。總體戰略與一般軍事戰略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考慮不僅僅是軍事準備或是國防配置等純軍事事務，而是包括了如何運用外交、軍事與經濟力量共同執行國家的對外政策和基本方針。依據現實主義學者 Christopher Layne 的說法，大戰略的形成應該包含以下三個階段：

- 一、對國家的重大安全利益做出判斷（determining a state's vital security interests）
- 二、認定對國家安全利益的威脅來源（identifying the threats to those interests）
- 三、決定如何運用政治、經濟、外交資源以保障其利益。^③

根據 Layne 的說法，大戰略的出現純粹是為了維護理性客觀的國家利益，與菁英無關，但實際上大戰略更往往受到國家領導人對國際形勢理解的影響。冷戰時期，美國傾其經濟政治之力量，全力圍堵蘇聯與共產主義的擴張，並輔以核子武力保持美蘇兩強間的軍事平衡的作法就是一種大戰略。美國的圍堵戰略與當時美國決策者對蘇聯的理解與對共產意識形態的排斥有絕對關係。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學者對如何重新定位美國的大戰略，也曾有過精彩的辯論。^④而部分中國學者既要兼顧官方馬克斯主義思想，又要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其外交政策辯護，竟也能創造出「霸權的出現及更替是資

註 ② Jisi Wa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Robinson an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K: Clarendon, 1994), p. 483; Mumin Chen, "Going Global: The Chinese Elite's Views of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1990s," *Asian Perspective*, vol. 29, no. 2 (June 2005), pp. 133-178.

註 ③ 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 88.

註 ④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Special Issue: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90/91), pp. 23-33; Christopher Layne,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Hegemony or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orld Policy Journal* (Summer 1998), pp. 8-28; Joseph Nye,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4 (July/August 1999), pp. 22-35.

本主義全球化的自然現象」這樣的論述。^⑥可見無論中國政治體制為何，領導人都可能根據其對國際情勢的理解建構出能符合其「認知的國家利益」的大戰略。^⑦但由於受到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影響，領導人在宣示中國對外政策時極少使用「大戰略」一詞，而傾向以「世界格局」或「時代主題」等概念來為其對外政策定調。^⑧

鑑於「大戰略」一詞所涵蓋之範圍過於廣泛，以下將以「安全戰略」一詞取代之。學者唐世平認為：安全戰略最重要的是確定國家安全政策的目的，追求國家理想的安全環境。^⑨可見中國政治菁英所認定的安全戰略主要指涉的是中國如何運用其外交政策塑造一個有利中國生存發展的國際環境。至於「理想安全環境」的界定則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而有所不同。依本研究的主要假設，影響政治菁英對安全戰略的認知因素有「規範」與「特定身份」兩大類。在以下討論中，對規範的討論將只限定在「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方向的主流看法」，而對特定身份的分析也將集中在「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自我定位」。其中前者可再分為「國際社會樂於接受中國發展壯大」與「國際社會把中國視為潛在威脅」這兩種態度。這兩種規範是否真已發展成「國際社會集體認可的共識」並非重點，而是中國政治菁英認知到國際社會存在著這兩種主流看法。以美國的中國政策為例，「交往」(engagement)與「圍堵」(containment)兩種態度在中國政治菁英眼中就成了美國是否將中國視為威脅的認定指標。後者也可再分為「堅持獨立自主外交」與「廣泛參與、積極負責」兩種態度。所謂「獨立自主外交」指的是對多邊國際協商或合作持比較抗拒態度，而廣泛參與則相反。例如中國對解決南海領土爭議的態度就逐漸由堅持不妥協轉為積極參與多邊合作對話。圖二所顯示的即為中國政治菁英建構安全戰略的各個變項及過程。

大體上來說，中國自 1978 年以來，政治菁英認知下的規範或身份一直在改變，前者（對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評估）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 1980 年代中期的樂觀轉為 1989 年後的悲觀，再轉為 1990 年代中期的樂觀；而後者（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自我定位）基本上是由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逐漸轉為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這樣的變化使得中國對外戰略呈現出數種不同面貌，並可依時間分為為三個時期：1979~1989 年；1989~1990 年代中期；1990 年代中期~目前。圖三說明了這三個時期與「對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評估」（縱軸）、「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自我定位」（橫軸）等兩個變項之間的關係。以下將進一步對這三個時期進行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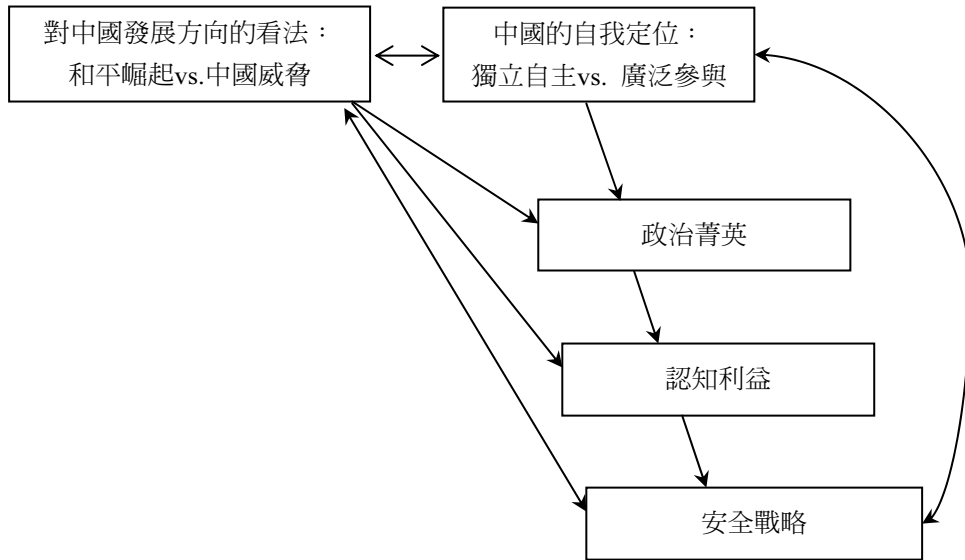
註⑥ 張文木，「中國國家安全哲學」，*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1 期（2000 年 1-2 月），頁 27-28。

註⑦ 1989 年間，鄧小平曾公開就國家利益取代階級利益成為中國外交政策準則一事進行論述，此後領導人及學者即開始使用國家利益概念闡述對外政策。相關內容請見：Mumin Chen, "From Isolation to Re-opening: Chinese Elite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1989-1992," presented for 16th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annual meeting (Knoxville, TN, USA, April 4-5, 2003), pp. 1-22.

註⑧ 中國學者對世界格局一詞至今尚無公認的定義，但大體上是指國際社會中主要強權之間的力量對比所形成的結構與互動過程。見：楊潔勉，*後冷戰時期的外交關係：外交比較政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36。時代主題的說法是根據列寧（V. Lenin）的理論而來。關於此議題之論述請見：何方，*論和平與發展時代*（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頁 61-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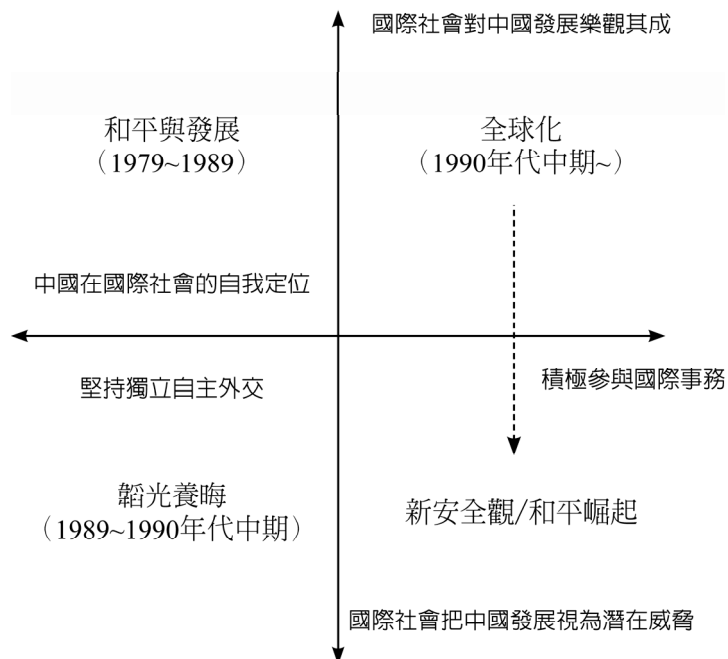
註⑨ 唐世平，「理想安全環境與新世紀中國大戰略」，*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6 期（2000 年），頁 42。

圖二 中國政治菁英建構安全戰略之過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三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三種安全戰略
對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評估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第一個時期應該從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為止。在這段時期裏領導人對國家發展方向的理解重點放在「要開放才能生存」。因為過去幾十年來的政策錯誤及政治動盪，使得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領袖在重新掌權之後的首要任務便是將國家發展的目標從原來的階級鬥爭轉變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口號下，改革派所提出的開放政策的重點放在吸引外資、加強出口、放鬆對貿易的管制等等。而沿海城市的開放與經濟特區的成立成為當時最大膽的嘗試。在國際社會上，中國強調的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高於一切，這樣的政策轉折其實是對 1960 及 70 年代以意識形態主導國家發展方向的修正。鑑於當時人民普遍認為過去領導人經濟政策與意識形態上過度左傾與所帶來的國際孤立應該早日結束，因此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改革派所提出的「實事求是、改革開放」理念多表支持，「和平與發展」口號因此成了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政治菁英認知國家利益的核心概念。^⑩

在對外關係上，當時領導人所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是：如何說服人民改革開放的必要性，而國際環境提供了什麼樣的條件。由於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領導人對外在環境的理解是美蘇之間的矛盾最終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因此解釋的重點是為什麼戰爭在短期內可能打不起來，而中國應該利用此一大好時機發展國內經濟。在整個 80 年代領導人對國際局勢的解釋大多集中在「時代主題」如何由過去強調的「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對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戰略重點也由過去全力準備戰爭到全力進行改革開放。換言之，和平與發展作為當時國際政治的主題對中國採取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礎。^⑪

由目前的文獻來看，鄧小平個人對當時「和平與發展」戰略的建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其實和平與發展論述從出現到定於一尊的過程並不如外界想像中順利，原因是 1980 年代初期與中期美蘇之間冷戰對立的情勢仍然存在，核武軍備競賽似乎尚無停止之日。因此在實際政策上，鄧小平的副手胡耀邦首先在 1982 年中共十二大中對 70 年代「一條線」戰略加以修正，提出「不結盟」的概念，也就是繼續批判美蘇的霸權行為，但已不再點名誰是霸權，代之的是一種「逢霸則反」的模糊策略，而對國際局勢的不滿更僅只於口頭層次，不提出任何具體行動。^⑫對國際安全環境的認知上，鄧小平的發言從 1980 年代初期的謹慎（戰爭威脅仍然存在，但短期內打不起來）逐漸轉變為 80 年代中期的審慎樂觀（要求和平的力量已經超過戰爭的力量）。^⑬到了 80 年代後期，在理解美蘇戰略互動與世界格局變化方面，領導人多已注意到美蘇兩大超強之間的對立已經慢慢鬆動。外交部長錢其琛更公開表示世界趨向多極化是「積極的發展」。^⑭戰略學者的發言也順勢轉為未來世界將是多極並立的局面，經濟集團化（日本、西歐

註 ⑩ 關於改革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取得權力的過程，見：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頁 5~154。

註 ⑪ 何方，**論和平與發展時代**，頁 3~52。

註 ⑫ 胡耀邦，「中共十二大工作報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文件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 264。

註 ⑬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04~106，126~129。

註 ⑭ 「世界多極化是個積極的發展」，**人民日報**（北京），1988 年 6 月 2 日，第 6 版。

等經濟集團相繼形成)與經濟一體化(整合)兩大趨勢將帶動世界格局的轉變。^⑤

第二個時期大致上由 1989 年到 1990 年代中期。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全面倒退的階段。國際社會對中國觀感快速惡化讓中國政治菁英認為外在國際環境已經由 1989 年之前的友善轉變為不友善。重視內部穩定發展更取代和平發展成為中國的主要立場。政治菁英所認知的國家利益由「改革開放」改為「維持國內政治穩定」與「應付國際環境壓力」。

對領導人而言，這一時期的外在環境變化對中國最大的挑戰是：

- 一、如何對付和平演變的問題：天安門事件無疑地對共產黨統治階層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再加上 1989 年到 1991 年之間蘇聯與東歐等共產主義國家相繼解體，使得領導人在國家安全議題上的首要任務是如何應付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類似的和平演變。但鑒於蘇聯東歐共產政權解體有很大的原因是國內經濟破產，使得領導人更加認定持續經濟改革是維持政權穩定的必要策略。如何在開放與穩定中尋求平衡逐漸成為對外開放的主要原則。
- 二、兩極解體後的新世界格局：當時領導人所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兩極解體後的世界格局究竟是什麼樣子？這個問題的討論早從 80 年代中後期便已經開始，但在蘇聯帝國瓦解之後變得更加重要。除了延續過去對未來世界將成多極並立的判斷之外，中國學者大多注意到在國際政治中經濟因素的重要性提升、而軍事因素的重要性下降的趨勢。國際經濟一體化(Integration)和集團化的趨勢對未來的世界格局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隨著國際間經濟集團化的趨勢加深，加上亞太地區經濟快速成長的事實，中國必須考慮與亞太地區國家建立更為緊密的經濟與政治關係。因此，推動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或加入亞洲國家為主的經濟區域集團也是中國此一時期的對外關係重點。^⑥

中國此一時期所採取的姿態比上個時期更低的「韜光養晦」戰略。中國媒體多認定「韜光養晦」一詞是鄧小平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面對國際孤立時所訂出的原則，其後領導人如外長錢其琛等也多次引用此理論。^⑦「韜光養晦」意為「不當頭」，也就是中國應避免在外交上與美國等西方強國發生衝突。因此雖然領導人在公開場合表明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主導國際新秩序，以抗拒西方國家對中國處理六四事件的批評，但同時也刻意在對外政策上淡化意識形態色彩，改談維護國家利益。^⑧部分政治菁英甚至直言：由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力量的對比對後者不利，所以中國既需要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一定的鬥爭，也需要爭取一定的合作，以利改革開放大計。^⑨

註⑤ 李岱、周陽，「略論當代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 3 期（1986 年 3 月），頁 5。

註⑥ 衛林，「當代國際體系特徵與九十年代世界格局」，*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8 期（1990 年 8 月），頁 30-40。

註⑦ 鄧小平於 1989 年 9 月 4 日曾以三句話闡明中國面對天安門事件後國際壓力所應有的作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往後中國媒體再加上「韜光養晦」四個字，成為 1990 年代初期中國外交的「十六字箴言」。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冊），頁 321。

註⑧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冊），頁 330。

註⑨ 邢賁思，「風雲驟變後的思索」，*科學社會主義*（北京），第 2 期（1992 年 2 月），頁 8-11。

第三個時期從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即已展開，但正式成為國家對外政策大約是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此時中國的安全戰略呈現出更多的自信與更強的企圖。主要是由於在前兩個時期的摸索使得中國國家安全的目標和國際環境的變化變得比較有脈絡可循。在這一個時期中國政治菁英多認定外在的安全環境已經正式由兩極解體進入美國領導下的多極新時代，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速也使得中國必需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局面。因此，中國對外國際環境的認定逐漸從上一個時期的充滿威脅逐漸修正為和平友善。此一時期的領導人如江澤民認為只要不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秩序，並藉由經濟全球化的機會大力發展經濟，中國應該可以走上一條平穩發展的道路，政權也可因此維繫不墜。將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擴張過程解釋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好機會是此一時期中國安全戰略的最大特徵，故此一時期中國的對外政策可以稱之為「全球化」戰略時期。江澤民更在 1997 年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正式將「全球化」定位為中國對外開放國策的依據：「面對經濟、科技全球化趨勢，我們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發展開放型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國民經濟素質提高。」^⑩很顯然地，中國政治菁英面對經濟全球化趨勢所帶來的巨大商機，以及國際上的自由民主潮流對中國威權政治體制仍然多所批評的情況下，最大的政治利益就在於如何將國家塑造為保證社會發展與經濟繁榮最基本的穩定力量。追求「全球化下的國家力量強化」遂成為此一時期領導人最重要的國家利益論述。

當然在「全球化」戰略中，中國首先必須面對的是國際格局的定位。即使領導人主觀上認定冷戰後的世界局勢是多強並立的「多極世界」，但隨著美國經濟的復甦及美國持續在全球維持軍事佈署，官方的論述也逐漸調整為美國獨霸的「一超多強」局面。以發展經濟提升綜合國力逐漸成為政治菁英深信不疑的「硬道理」，因此引出「中國經濟發達程度將決定中國是否成為強國」的主流論述。^⑪此外，雖然對外開放政策已成功帶動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但開放政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同時浮現出來。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開放過快導致國內政經動盪的一個明顯例子。誠如閻學通所言，金融風暴在某些地區所引發的國家分裂、種族衝突、經濟力大幅萎縮，其嚴重性不亞於經歷一場局部戰爭。^⑫中國戰略學者逐漸認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一定要考慮經濟安全的問題。^⑬「對外開放」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連繫由於經濟安全的重要性提升而變得更加緊密。^⑭最後，中國在經濟地位增加的同時，也開始思考如何利用逐漸升高的國家經濟地位來增加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這樣的言論大多集中在中國必須增強對國家

註⑩ 江澤民，「十五大工作報告」，人民網，1997年9月12日，<http://zg.people.com.cn/BIG5/9508/11962/index.html>，檢索日期：2006年2月30日。

註⑪ 陸國強、張小濟，「新戰略：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對外開放的幾個戰略問題」，國際貿易（北京），第4期（2000年4月），頁6。

註⑫ 閻學通，「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分析與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2期（2000年2月），頁9。

註⑬ 楚樹龍，「冷戰後中國安全戰略思想的發展」，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9期（1999年9月），頁14~15。

註⑭ 宋以敏，「全球化新發展和國際關係的複雜化」，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2期（1999年2月），頁1~5。

安全戰略的研究、對時代主題的探討（和平與發展是否仍然為時代主題）、和對國際政治大循環的辯論上（中國是否要採取趕超戰略以追上發達國家）。

以上分析仍然有兩個地方必須加以說明。第一，安全戰略由「韜光養晦」轉向「全球化」階段的確切時間不易認定。就改革開放政策來說，政治菁英多半將 1992 年初鄧小平南巡時的「批左」講話作為 1979 年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思想突破，但支持與反對改革開放者之間的爭論必須等到 1997 年 5 月江澤民發表的「高舉鄧小平理論大旗」五二九談話，以及該年 9 月的中共十五大報告才算正式落幕。同樣在安全戰略上，江澤民早在十五大便正式將全球化概念納入對外關係論述之中，但其後許多領導人仍繼續使用韜光養晦一詞。因此由「韜光養晦」進入「全球化」是一個緩慢且漸進的過程，不似「和平與發展」與「韜光養晦」兩時期之間，因天安門事件與冷戰結束可以明確劃分。第二，由圖三來看，全球化時期中國的安全戰略究竟是屬於右上角的第一象限（對中國發展樂觀其成）還是右下角的第四象限（把中國視為潛在威脅）在認定上也有困難。作者認為在全球化時期的前半期，政治菁英不僅對中國未來發展深具信心，且普遍對外在安全環境持比較樂觀態度；但隨著對國際格局的看法由「多極世界」修正為「一超多強」，以及國際社會反對中國的聲音仍然存在的趨勢下，已經逐漸修正為謹慎小心。因此中國安全戰略有由第一象限轉向第四象限的趨勢（見圖三虛線部分）。

叁、「中國如何崛起」辯論的出台

當江澤民等領導階層開始以全球化角度來構思中國應有的戰略觀之際，中國的戰略學界開始對「中國將如何崛起」這樣的問題展現高度興趣。這樣的討論證明了中國的快速經濟成長使得知識界開始對國家未來的發展顯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但另一方面，所謂「崛起戰略」的討論也可顯示部分學者企圖利用學術論壇為執政者量身訂做一套符合當時改革開放氣氛的政治方略，以提升學界在決策者心中的影響力。1995 年第 5 期的**戰略與管理**雜誌，刊登了一篇由時殷弘所撰寫的「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啓示」文章，文中引用 George Modelski 的近代世界政治大循環理論，認為中國在未來有三種戰略可供選擇：「自助」（self-help）；「不出頭」（hiding）；「搭車」（bandwagoning，台灣翻譯為扈從）。所謂「自助」，即是在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依靠自身的軍事、經濟、外交努力來保障其安全、獨立與強大。「不出頭」的實例就是美國歷史上的孤立主義。而「搭車」的戰略則是與一流大國合作，爭取其支持，以有效抵銷來自大國或國際體系的壓力。時殷弘指出，中國應該就這三種戰略不一定相互排斥，但中國應該就這三種戰略選擇其一，作為世紀性對外戰略，並形成今後半世紀的基本外交哲學。^⑤

時殷弘的文章揭開了往後中國戰略學界裡一連串關於中國崛起戰略的辯論。當然

註⑤ 時殷弘，「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啓示」，**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2 期（1995 年 3-4 月），頁 1-3。

在辯論之初並非所有學者都認同時殷弘所言，認為國際政治存在著一個霸權相互交替的長期規律。1996年第1期的**戰略與管理**刊載了一篇由唐永勝所撰寫的論文，其中便指出 Modelski 的理論並不能完全解釋當前世界大國地位的消長。^④然而在時殷弘之後，一系列關於中國未來崛起戰略的文章相繼在**戰略與管理**與其它同性質的期刊上刊載，成為1990年代後期中國戰略學者討論最熱烈的議題之一。這些關於中國崛起的辯論大致可分為兩種主要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認為中國崛起必將牽動中國與鄰近國家的關係，因此如何精確訂出中國國家安全利益，以及保障其國家利益的基本戰略將成為當代領導人最關切的議題。認同此一立場的戰略學者多半是現實主義學者。舉例來說，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認為，中國對國際社會應該採取「積極參與」的態度，一方面積極防止美國聯合周遭國家共同遏止中國崛起，另一方面在國際上讓中國參與國際秩序的建構。換言之，中國應該以「鬥爭加合作」的方式，使國際社會正視中國的存在。^⑤另一位學者張文本則表示中國在新世紀應該將國家安全視為「維護國家發展權」的核心概念，中國不僅應該由傳統的維持領土安全轉變為維護中國在世界政治上的政治與經濟利益，也應該將集中在陸權的傳統作戰方式轉變為制空權、制海權與制電磁權一體的新作戰方式。^⑥

第二種觀點是肯定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但中國應該更加謹慎，在對外關係上避免採取霸氣作為，也應避免挑戰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採取此一立場的學者頗多，以下僅舉二者為例說明。1998年第2期的**戰略與管理**，刊出由喻希來和吳紫晨所撰寫的「世界新秩序與新興大國的歷史選擇」一文，對中國未來的崛起戰略提出三種選擇：孤立主義、現實主義、理想主義。文中批評孤立主義與現實主義已不合時宜，最後期許中國成為一個「充滿理想主義又腳踏實地建設世界新秩序的負責任大國」。^⑦另一位學者唐世平則認為，中國在成為大國的過程中，除了融入既有的國際秩序外，似乎沒有其它的選擇。唐極力駁斥中國應該積極發展遠洋海軍的觀點，認為發展軍力必須符合國家安全戰略，同時也應該量力而為。^⑧

由後來的發展來看，這兩種觀點都可解讀為政治菁英所認知的國家利益，並因此發展出當前中國對外安全戰略的兩種政策主張。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觀點與兩種主張之間不必然只存在單一的因果關係，而是這兩種觀點經政治菁英吸收後，在江澤民與胡錦濤主政時期先後發展出兩種不同的政策。第一種政策強調中國應該在全球化時代下建立一套與鄰國持續合作與對話、以降低敵意的安全機制。中共官方將這種觀點稱之為「新安全觀」，並由其外長錢其琛於1997年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註④ 唐永勝，「國際政治長週期規律在當代的演變」，**戰略與管理**（北京），第1期（1996年1-2月），頁46-51。

註⑤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可能選擇」，**戰略與管理**（北京），第2期（1995年3-4月），頁11-14。

註⑥ 張文本，「中國國家安全哲學」，頁24-32。

註⑦ 喻希來、吳紫晨，「世界新秩序與新興大國的歷史選擇」，**戰略與管理**（北京），第2期（1998年3-4月），頁1-13。

註⑧ 唐世平，「再論中國的大戰略」，**戰略與管理**（北京），第4期（2001年），頁29-37。

Forum, ARF) 在北京舉辦的建立信任措施會議中正式提出，江澤民本身也多次引用。^⑤ 依照中國官方的說法，新安全觀的核心應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等四個概念：

「互信」是指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異同，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心態，互不猜疑，互不敵視。各國應經常就各自安全防務政策以及重大行動展開對話與相互通報。「互利」是指順應全球化時代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互相尊重對方的安全利益，在實現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時，為對方安全創造條件，實現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都是國際社會的一員，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別國內政，推動國際關係的民主化。「協作」是指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並就共同關心的安全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隱患，防止戰爭和衝突的發生。^⑥

而第二種政策便是胡錦濤上台後由鄭必堅所提出的「和平崛起」理論。鄭必堅在 2003 年的博鰲論壇中，曾經對中國和平崛起之路提出三條重要戰略方針：

一是毫不動搖地銳意推進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基本內涵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證；二是大膽借鑒吸收人類文明成果而又堅持弘揚中華文明，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周到細緻地統籌兼顧各種利益關係，包括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社會環境。^⑦

鄭必堅認為：中國發展的方向是繼續保持與經濟全球化的密切聯繫，而不是脫離。「這本身就是中國人的一個重大的歷史性戰略抉擇」。^⑧

無疑的，「新安全觀」與「和平崛起」將在不久的未來繼續成為中國官方闡述國家安全戰略的兩大主張，其中新安全觀將被定位為處理中國處理與鄰近亞洲國家之間安全對話的基本原則，而和平崛起將成為中國對美國、歐盟等表態中國無意挑戰當前國際政治秩序的正式態度。這樣的印象是根據中國官方使用這兩個概念的場合來作區分，其真正原因有待進一步探討。如純粹從時間來看，新安全觀在官方文件中正式出現大約是 1999 年至 2000 年間，而和平崛起論述正式出現是在 2003 年至 2004 年間，明顯前者是江澤民主政時代的安全戰略論述、而後者則是胡錦濤上台後的產物。但由目前中國官方的立場來看，胡、溫等人並未摒棄新安全觀論述，但多半將其放在處理與中國在地緣上鄰近的國家如東協各國、俄羅斯、中亞鄰國進行安全對話的場合；也由於新安全觀是在江澤民時代提出，爭議較少，中共各級領導人仍時常引用。^⑨這或許與新安全觀所強調的互信、互利、平等、協作核心價值比較容易獲得這些國家共鳴有

註 ⑤ 此一觀點的背後推動者是以研究全球化與國家安全見長的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所長王逸舟。王對新安全觀的闡釋可見 1999 年 2 月他發表在 *Beijing Review* 的文章：Wang Yizhou, "New Security Concept in Globalization," *Beijing Review*, Feb. 15-21, 1999, p. 7.

註 ⑥ 「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頁，2006 年 2 月 25 日，<http://www.fmprc.gov.cn/chn/wjbx/zjg/gjs/gjzzyhy/1136/1138/t4549.htm>。

註 ⑦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未來」，2003 年博鰲論壇演講。

註 ⑧ 同前註。

註 ⑨ 最近的例子是中共國防部長曹剛川於 2005 年 8 月視察中俄聯合軍演時提出。「中俄國防部長舉行記者招待會」，*大公報*（香港），2005 年 8 月 26 日，<http://www.takungpao.com/news/2005-8-26/ZM-447919.htm>（檢索日期：2006 年 7 月 15 日）。

直接關係。東協自成立以來大力提倡之相互尊重與共同促進區域安全等原則與中國提出之新安全觀有許多契合之處。^⑥和平崛起論述則是由溫家寶於 2003 年訪美期間正式提出，明顯是針對美國。和平崛起雖然在 2004 年中之後被和平發展的口號所取代，但從鄭必堅持續對透過外國媒體重申其主張，且相關討論在中國並未完全遭禁的情況來看，此一口號未來仍可能重新成為胡、溫的重要執政理念。

新安全觀或和平崛起對當代中國領導人的政治利益為何？前文曾提及中國政治菁英所認定的安全戰略是如何運用其外交政策塑造一個有利中國生存發展的國際環境，因此這些冠冕堂皇口號的背後隱含著中國領導人逐漸意識到外在國際環境並不一定如 1990 年代中期所預設的和平友善——中國在進入全球化戰略階段之後期望以積極態度參與國際事務的作法往往被曲解為中國將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企圖。近年來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的確比過去更為友善，但部分國際關係學者大力鼓吹中國國家安全環境受到威脅的言論顯示這些政治菁英認為不利中國發展的因素仍然存在，特別是台灣問題與中美關係。故領導人提出新安全觀與和平崛起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消解國內輿論界認為國際環境不利於中國的因素，創造出一個符合社會上「期待中國壯大」論調的政策論述，強化其統治基礎。由此觀之，2004 年初的和平崛起風波可能只是江、胡等人對安全戰略表述方式的差異，並不影響官方對外環境逐漸由和平友善修正為威脅不友善的看法。

肆、台灣問題：中國和平崛起的障礙？

為了平息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之間的爭議，中共中央黨校發行的**學習時報**曾經在 2004 年 8 月間刊載了一篇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是否可能」的文章。文中指出雖然和平崛起是對外不搞侵略擴張，但如果有任何國家「以武力干涉中國的國家統一，那就是破壞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的和平崛起之路必須以國家統一為前提，以武力手段解決台灣問題與和平崛起之間並不矛盾。」同時該文更直言台灣問題是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個「坎」（障礙之意）。^⑦台灣問題與中國安全戰略之間的關聯，為本節討論的重點。

可以確定的是，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前，台灣問題並未成為中國安全戰略的關切焦點。舉例而言，王逸舟在 1993 年所發表的一篇關於中國安全環境的文章中，提到了 6 個中國周遭不穩定的地區或議題，其中包括日本、朝鮮半島、中亞等等。其中雖然將台灣「民進黨等台獨勢力的崛起」與香港人民抗拒回歸的心態並列為中國所面臨的外交難題，卻沒有明確表示應該採取何種具體措施。^⑧在另一篇分析後冷戰時期中國國家安全環境的文章中，作者也列舉了中國周遭幾個未來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熱點，其中

註 ⑥ 中國已在 2003 年正式簽署加入東協於 1976 年簽訂之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成為第一個加入該條約之非東協國家。

註 ⑦ 陳先奎、辛向陽，「中國崛起是否可能」，**學習時報**（北京），2004 年 8 月，<http://www.studytimes.com.cn/chinese/zhuanli/xxsb/648323.htm>（檢索日期：2006 年 3 月 1 日）。

註 ⑧ 王逸舟，「中國國家安全環境」，**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6 期（1993 年），頁 34-37。

並無台灣。^⑤當中國戰略學者如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研究員李少軍在 1990 年代中期將國家安全利益的概念引進中國戰略學界時，主要談的也是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與經濟利益，但並未特別提出「收復台灣」是中國領土完整的重要目標。^⑥

有趣的是，在中國正式進入全球化戰略期之後，台灣問題反而逐漸成為戰略家們評估中國安全戰略與安全利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閻學通大概是首位將台灣問題具體劃歸為中國安全利益的學者。在**中國國家利益分析**（1996）一書中，閻將中國境內的分裂活動勢力，特別是台灣與西藏的獨立運動，視為對中國戰略利益的重大威脅。閻主要著眼於台灣海峽一旦開打，中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經濟規模必定會受到嚴重的影響，現代化建設所需的和平環境也將受到嚴重破壞。^⑦最早引起「中國崛起戰略」討論風潮的時殷弘，也在 2000 年第 2 期的**戰略與管理**上，提出將台灣問題納入中國安全戰略考量的觀點。他認為中國以強制手段處理台灣問題的方式有以下三種：大規模軍事打擊，一舉解決台灣問題；實施有限軍事打擊，迫使台灣當局接受一個中國原則認真從事統一談判；以軍事壓力與外交、政治手段雙管齊下，達到與軍事手段同樣的效果。時殷弘認為，在考量美國的反應之下，採取第二種與第三種選項將是代價最小、也比較不會引起美國大規模軍事干涉的作法。^⑧

另一位知名的地緣戰略學者張文木點出台灣對中國地緣戰略的重要性：「台灣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門戶，是日本南下必經之途。控制一個與中國分離的台灣，美國就可北遏制日本、南威懾東盟、西可堵截中國。從美國的亞太地緣政治需求來看，使台灣、南沙、甚至西藏地區與中國事實分裂，符合美國與其盟國繼續稱霸世界的長遠戰略」。張並指出：「中國在台灣問題上與西方國家的鬥爭，不僅僅是中國為維護自身主權的鬥爭，還是中國為維護自身發展權的鬥爭」。^⑨

有更多的戰略分析家將台灣視為中國與美國實力較量的關鍵因素。朱成虎、唐永勝、蒲寧所合著的**走向 21 世紀的大國關係**一書中指出：「美國之所以不惜損害中美關係而提升對台灣的實質關係，主要是基於冷戰後美國對中國的重新定位和對亞太地區戰略形勢的判斷」。^⑩中國外交部直屬智庫「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蘇格在 2001 年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國在冷戰之後對中國一直是執行所謂的雙軌政策：一方面認知美國必須與中國合作才能實現其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因此對中國提出全面交往政策；另一方面，美國不甘心中國強大、但又無力阻止中國崛起，因此只能以台灣問題拴住北京，讓海峽兩岸鸚鵡相爭，美國就可坐收漁利。^⑪

經由對中國政治菁英在戰略相關期刊所發表之文章與著作分析，可發現越來越多

註⑤ 陳佩堯，「冷戰後我國國際環境初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3 期（1994 年），頁 1~6，89。

註⑥ 李少軍，「國家安全理論初探」，**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2 期（1995 年 12 月），頁 38~42。

註⑦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54~160，172~178。

註⑧ 時殷弘，「關於台灣的幾個必須正視的大戰略問題」，**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2 期（2002 年 3~4 月），頁 27~32。

註⑨ 張文木，**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72~73。

註⑩ 朱成虎、唐永勝、蒲寧，**走向 21 世紀的大國關係**（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26。

註⑪ 蘇格，「美國全球戰略與台灣問題」，**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 4 期（2001 年 4 月），頁 1~7。

的政治菁英已逐漸認知到「台灣獨立」已是一個難以化解的政治難題，因此有更多戰略學者建議政府趁早針對各種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進行精確評估。舉例而言，在決策階層與戰略學界具有廣大影響力的**戰略與管理**雜誌在 2004 年的所出版 4 期中（該刊已因第 4 期刊出一篇批評北韓的文章而遭勒令停刊）共刊出 4 篇關於台灣問題的文章，頻率為歷年之冠。^⑥而北京著名戰略智庫，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主編之**現代國際關係月刊**過去極少刊登關於台灣問題之分析文章，卻也在 2006 年史無前例地陸續刊出 3 篇相關論文。^⑦這樣的趨勢顯非偶然，以菁英認知的角度來看，顯見有一定數量的戰略學者認定台灣問題已逐漸成為迫切需要回應的議題。此類由知識菁英執筆的文章正反應出中國政治菁英對中國未來走向的思維轉變，也象徵著胡錦濤等新一代領導人對台灣問題將採取比江澤民時代更加積極的態度，以避免台灣問題出現失控情況。

為何「台灣問題」在過去幾年內突然躍升為政治菁英們心中關切的「國家安全利益」呢？筆者推測這樣的發展可能與中國崛起戰略的辯論有關：

首先，當領導人與戰略學者們逐漸習慣於將「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等抽象概念視為可經精確評估而轉化為供決策參考的數據時，「台灣問題」對中國政治穩定與政權合法性影響程度也就自然而然變成影響結果的指標之一。在以精確方式計算國家利益的過程中，決策者及其智囊們對於兩岸關係的走向如何影響中國的整體對外關係與國際形象逐漸發展出一套特有的計算方法。鑑於 1996 年台海危機時中國採取的強硬作風與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使往後領導人在制訂對台策略時，認知到將台灣問題的各种選項進行精確評估的重要性。

其次，在中國如何崛起的辯論過程中，決策者與戰略分析家逐漸相信中國未來是否能發展成區域甚至世界強國的關鍵在於美國的態度，而美國一直將台灣作為牽制中國向太平洋發展的一招活棋。在這些學者眼中，「懼怕中國強大」是美國繼續支持台灣的主要原因，因此台灣問題與人權議題、西藏獨立一樣，完全只是美國交互運用企圖阻撓中國「統一和穩定」的策略之一。^⑧

最後，由於台灣在 2000 年民進黨上台執政後挑動兩岸敏感神經的種種作為，使得中國媒體與知識界對台灣強硬的聲音逐漸抬頭。這些充滿情緒性的民族主義言論認為領導人在對台政策上不宜太過軟弱。戰略分析家與學者將台灣問題納入中國崛起戰略中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的考慮之內，一方面符合當時的政治氣氛，另一方面也能增加其對決策的影響力度。

並非所有政治菁英都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中的主要障礙。2003 年間北京大學丁元竹教授曾對 98 位中國的政府與非政府專家進行諮詢，請其預測中國在

註⑥ 2001 年至 2003 年間（共 18 期）該刊所刊登之論文中，僅有兩篇分析台灣問題。

註⑦ 邵育群，「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不支持台獨政策評析」，**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2 期（2006 年 2 月），頁 54-59；李慶春，「從陳水扁宣布終統看美對台政策的困境」，**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38-40、62；陳炯、刑悅，「美國國會對台議案的表決特點：對 1990 年以來美國國會投票行為的研究」，**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41-45。

註⑧ 胡凡、李大光，**大國的尊嚴：構築 21 世紀國家安全的堅固堡壘**（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頁 369。

2010 年前可能出現影響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主要風險因素，以及這些風險對社會的衝擊程度。結果發現，中國最可能出現危機的領域分別是社會問題（21.25%）、金融問題（18.75%）、經濟問題（12.25%）、就業問題（10%）。如果按照出現頻率統計，則排名最高的五項分別為社會問題（14.22%）、經濟問題（11.21%）、金融問題（11.21%）、環境問題（8.62%）、信心危機（8.19%）。認為台灣問題在 2010 年之前會成為危機的比例只有 3.88%，在整體排名中為第 11 名。^⑥另一個有關台灣問題的數據來自人民日報網站人民網於 2003 年 12 月 9 日刊出的文章，內容引述香港大公報的報導，表示中國一間民間市調公司「零點集團」最近訪問北京上海等 7 個大中型城市、河北浙江等 7 省小城鎮及農村 3968 位居民關於兩岸關係之看法，結果發現受訪者認為中國應立刻使用武力統一的比例只有 14.7%；認為兩岸能維持現狀，但未來仍不免一戰的比例也只有 13.2%；認為兩岸之間應能致力經濟合作，以利未來統一的比例高達 60%。^⑦這些曾在中國媒體公開的調查數據顯示領導人與戰略家分析家所認知的台灣問題迫切性與其他知識菁英甚至一般民衆之間仍存在極大的差距，也顯示台灣問題威脅中國和平崛起的說法其實只是部分政治菁英對中國國家利益的主觀認知的結果。

伍、結論：菁英、認知與外交政策

由菁英的「認知」角度來理解中國的對外政策，可發現無論是韜光養晦、和平崛起，還是和平發展，都只是中國決策者與戰略分析家對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的一種主觀理解後所做出的反應。這樣的理解源於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政治菁英對中國現有國際地位與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秩序感到不滿，而期望透過對崛起方式的辯論，找到一條讓中國強國地位被正式認可的道路。「台灣問題」的重要性在此完全突顯出來：對決策圈與戰略學界中的「強硬派」來說，及早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是讓中國躍升為世界強國、突破美國圍堵策略的必然步驟；對「務實派」來說，台灣地位是中國與美國在亞洲戰略互動過程中最為棘手的問題，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台灣問題，則中國在改革過程所強調的和平穩定國際環境將會受到嚴格考驗。無論台灣問題是否應該以武力解決，強硬派與務實派都不約而同的將台灣問題在中國國家利益的序列中提升到最高的層次，使得決策者不得不持續對台灣問題表態，而兩岸僵局也就毫無緩解的可能。

其實這些因誤解對方意圖而產生的思維只是兩岸關係中的「認知因素」(cognitive factors)：對兩岸之間的實力對比與消長並無直接影響，也不具有危及兩岸政治現狀的能力，但對決策過程與策略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更由於兩岸政府之間缺乏互信基礎，這些思維在民族主義情緒推波助瀾之下，已經逐漸在兩岸的決策圈裡發酵，使得兩岸之間爆發衝突的可能性逐漸增加。過去研究中國外交政策與兩岸關係的學者多

註⑥ 丁元竹，「2010 年：中國的三種可能前景」，*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4 期（2004 年 7-8 月），頁 1~15。

註⑦ 「大陸主流民意不容忍台獨」，*人民網*，2003 年 12 月 9 日，<http://tw.people.cn.GB/14810/14858/2235881.html>（檢索日期：2006 年 3 月 1 日）。

半重視亞太區域（或是兩岸之間）軍力是否失衡，而忽略決策者對環境的負面認知對政策可能造成的影響。重新檢視兩岸之間的認知因素或許是未來研究兩岸關係的一個新的切入點。

由中國政治菁英論述安全戰略的過程來看，讓中國成爲一個和平且負責任大國的最佳方式，是讓掌握政策論述主導權的政治菁英真正理解到中國的國家安全並未受到威脅。改革開放 20 餘年間，中國對外安全戰略最溫和的時期大約是至 1995 年左右，也就是由「韜光養晦」轉向「全球化」的階段；當時中國政治菁英一方面認爲國際社會願意接納中國，也認爲中國應該積極加入國際社會，因此在安全戰略上大力宣傳國際和平環境有利中國發展，甚至在對台政策上也曾出現「江八點」等低調軟性訴求。但在歷經一連串具有「衝突」性質的事件，例如 1996 年台海危機、1999 年北約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聯邦大使館、以及 2001 年中美軍機於南海互撞等事件之後，中國安全戰略論述逐漸轉向，甚至出現早日解決台灣問題的論調。雖然領導人相繼提出「和平崛起」與「新安全觀」等口號，但是政治菁英對外在安全環境卻不如原來樂觀。由此觀之，國際社會應該嘗試創造出一些對中國發展方向的共識規範，強調對中國現代化樂觀其成，藉此逐步引導北京領導人將國家政策朝和平解決歧見、尊重普世人權的方向發展，而非以「圍堵」或「權力平衡」方式防止中國壯大。這類現實主義式的回應策略只會加深中國政治菁英的疑慮，讓領導人繼續將國家發展方向定位在「富國強兵」、「對抗美國霸權」的道路上。總而言之，如何將中國的安全戰略引導回類似在 1995 年（既強調國際和平環境又願意廣泛參與）的溫和路線，不僅提供戰略研究者一個在理論上可以繼續探索的空間，也是台灣決策者應該認真思索的方向。

* * *

（收件：95 年 3 月 13 日，複審：95 年 5 月 15 日，第二次複審：95 年 8 月 25 日，接受：95 年 10 月 2 日）

When Peaceful Rise Meets the Taiwan Issue: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from Elite Perspectives

Mu-min Che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how Chinese elites interpret China's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how such assessments influence the formulation of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Chinese leaders and strategic analysts have utilized power to identify the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being it peaceful or hostile—and the security strategy they make to strengthen their power and interests in the society. The article assumes that elite cognition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re determined by two factors: assessment of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their subjective identification of China's role and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Connections between both factors constitute a fundamental force modulating the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of political elites. The article also analyzes the debates about the strategy of China's rise since the mid-1990s and its connections to the Taiwan issue.

Keywords: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ecurity strategy; peaceful rise; Taiwan issue; political elite; cognitive theories

參考文獻

- 「大陸主流民意不容忍台獨」，**人民網**，2003年12月9日，<http://tw.people.cn.GB/14810/14858/2235881.html>。
- 「中俄國防部長舉行記者招待會」，**大公報**（香港），2005年8月26日，<http://www.takungpao.com/news/2005-8-26/ZM-447919.htm>。
- 「中國的和平崛起 有利於世界和平發展的戰略選擇」，**解放軍報**（北京），2004年3月29日，第11版。
- 「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jzzyhy/1136/1138/t4549.htm>。
- 「世界多極化是個積極的發展」，**人民日報**，1988年6月2日，第6版。
- 「溫家寶總理哈佛演講：把目光投向中國」，**人民網**，2003年12月11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shehui/1061/2241298.html>。
- 「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 110 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政府網**，2003年12月26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5-06/26/content_9580.htm。
- 「胡錦濤強調國家主權放第一位：中共政治局集體學習，指示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聯合報**，2004年2月25日，第A13版。
- 「胡錦濤下令建構和平崛起理論」，**聯合報**，2003年12月16日，第A13版。
- 丁元竹，「2010年：中國的三種可能前景」，**戰略與管理**，第4期（2004年7-8月），頁1~15。
- 王銘義，「只談發展，不談崛起」，**中國時報**，2004年8月29日，第A4版。
- 王逸舟，「中國國家安全環境」，**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6期（1993年），頁34~37。
- 江澤民，「十五大工作報告」，**人民網**，1997年9月12日，<http://zg.people.com.cn/BIG5/9508/11962/index.html>。
- 朱成虎、唐永勝、蒲寧，**走向 21 世紀的大國關係**（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 何方，**論和平與發展時代**（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
- 邢賁思，「風雲驟變後的思索」，**科學社會主義**（北京），第2期（1992年2月），頁8~11。
- 李岱、周陽，「略論當代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3期（1986年3月），頁1~5。
- 李慶春，「從陳水扁宣佈終統看美對台政策的困境」，**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3期（2006年3月），頁38~40。
- 李少軍，「國家安全理論初探」，**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12期（1995年12月），頁38~42。
- 宋以敏，「全球化新發展和國際關係的複雜化」，**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2期（1999年2月），頁1~5。
- 邵育群，「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不支持台獨政策評析」，**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2期（2006年2月），頁54~59。

- 胡耀邦，「中共十二大工作報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文件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 264。
- 胡凡、李大光，**大國的尊嚴：構築 21 世紀國家安全的堅固堡壘**（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 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 唐永勝，「國際政治長週期規律在當代的演變」，**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1 期（1996 年 1-2 月），頁 46~51。
- 唐世平，「再論中國的大戰略」，**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4 期（2001 年），頁 29~37。
- 唐世平，「理想安全環境與新世紀中國大戰略」，**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6 期（2000 年），頁 42。
- 時殷弘，「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啓示」，**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2 期（1995 年 3-4 月），頁 1~3。
- 時殷弘，「關於台灣的幾個必須正視的大戰略問題」，**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2 期（2002 年 3-4 月），頁 27~32。
- 莫大華：「論國際關係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9 期（1999 年 9 月），頁 93~108。
- 黃旻華：「評『論國際關係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11 期（2000 年 11 月），頁 71~94。
- 喻希來、吳紫晨，「世界新秩序與新興大國的歷史選擇」，**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2 期（1998 年 3-4 月），頁 1~13。
- 陳佩堯，「冷戰後我國國際環境初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3 期（1994 年 3 月），頁 1~6，89。
- 陳先奎、辛向陽，「中國崛起是否可能」，**學習時報**（北京），2004 年 8 月，<http://www.studytimes.com.cn/chinese/zhuanti/xxsb/648323.htm>。
- 陳炯、刑悅，「美國國會對台議案的表決特點：對 1990 年以來美國國會投票行爲的研究」，**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41~45。
- 賴錦宏，「胡錦濤強調國家主權放第一位：中共政治局集體學習，指示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聯合報**，2003 年 12 月 16 日，第 A13 版。
- 張文木，「中國國家安全哲學」，**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1 期（2000 年 1-2 月），頁 27~28。
- 張文木，**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72~73。
- 隆國強、張小濟，「新戰略：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對外開放的幾個戰略問題」，**國際貿易**（北京），第 4 期（2000 年 4 月），頁 6。
- 衛林，「當代國際體系特徵與 90 年代世界格局」，**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8 期（1990 年 8 月），頁 30~34。
- 楚樹龍，「冷戰後中國安全戰略思想的發展」，**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9 期（1999 年 9 月），頁 14~15。

- 楊潔勉，**後冷戰時期的外交關係：外交比較政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可能選擇」，**戰略與管理**（北京），第2期（1995年3-4月），頁11~14。
-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 閻學通，「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分析與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2期（2000年2月），頁9。
-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未來」，**2003年博鰲論壇演講**，2003年11月3日，<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OP-c/448115.htm>。
- 蘇格，「美國全球戰略與台灣問題」，**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4期（2001年4月），頁1~7。
- Chen, Mumin, “From Isolation to Re-opening: Chinese Elite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1989-1992,” presented for 16th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annual meeting (Knoxville, TN, USA, April 4-5, 2003), pp. 1~22.
- Chen, Mumin, “Going Global: The Chinese Elite’s Views of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1990s,” *Asian Perspective*, vol. 29, no. 2 (June 2005), pp.133~178.
- Checkel, Jeffrey 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50 (January 1998), pp. 324~328.
- Cox, Robert W.,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vol. 10, no. 2 (1981), pp. 126~155.
- Cox, Robert W. and Timothy J.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Devetak, Richard, “Critical Theory,”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6), pp. 145~178.
- Ferguson, Yale and Richard Mansbach, *The Elusive Que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3).
- Goldfischer, David, “Resurrecting E.H. Carr: A Historical Realist Approach for the Globalization Er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8, no. 4 (2002), pp. 697~717.
- Goldstein, Judith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Hopf, Ted,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p. 171~200.
- Jepperson, Ronald,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4~75.
- Katzenstein, Peter J. ed., “Introduction,”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1.
-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 Krasner, Stephen,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Krauthammer, Charles,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Special Issue: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90/91), pp. 23~33.
- Krause, Keith and Michael Williams, "From Strategy to Security: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Studies," in Krause and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36~43.
- Layne, Christopher,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86~124.
- Layne, Christopher,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Hegemony or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orld Policy Journal* (Summer 1998), pp. 8~28.
- Nye, Joseph,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4 (July/August 1999), pp. 22~35.
- Tkacik, John J. Jr., "China's Peaceful Rise at Stake in Power Struggle," *Asian Times*, September 8, 2004, <http://atimes.com/atimes/China/FI08Ad03.html>.
-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 Wang, Jis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Jame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K: Clarendon, 1994), pp. 481~505.
- Wang, Yizhou, "New Security Concept in Globalization," *Beijing Review*, Feb. 15-21, 1999, p. 7.
- Wendt, Alexander,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 71~81.